



性别意识与  
女性形象

● 梁巧娜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院图书馆

# 性别意识与 女性形象

梁巧娜/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红 梅

美术编辑: 李 静

图书在版(CIP)数据

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 / 梁巧娜著. —北京: 中央民族  
大学出版社, 2004.8

ISBN 7-81056-909-0

I. 性... II. 梁... III. 女性—人物形象—文学创  
作—研究 IV. 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58810号

---

书 名: 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

作 者: 梁巧娜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邮 编: 100081

电 话: (发行部) 68472815 (总编室) 68932218

印刷者: 廊坊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4年8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909-0/I · 61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更换

# “左撇子”思考

——序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

黎湘萍

世上最初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另外一种是人。世界上的故事都是他们讲述的，其中有男人讲述的男人与女人的故事，也有女人讲述的女人与男人的故事，当然也有他们讲述的动物、植物、山川河流、鬼灵精怪的故事。不管怎样，这些故事，其实都是“人”的故事（我们至今未能了解动物是如何讲述人的故事的）。人的故事由谁去讲述？男人讲述与女人讲述有差别吗？怎么讲述？为何讲述？以前没有人去深究思考，人们愿意听的是“故事”本身。《伊索寓言》有一则“演说家”<sup>1</sup>云：

从前，演说家得马得斯在雅典城演讲，听众都不注意听，他就请大家允许他讲段伊索寓言。听众大为赞成，他开始讲道：“得墨忒尔同一只燕子、一条鳗鱼一起上路。到了一处河边，燕子飞走了，鳗鱼钻到水里去了。”他讲到这里，便不做声。听众问道：“得墨忒尔怎么样呢？”得马得斯回答说：“她生你们的气呢，因为你们不关心城邦大事，一心只想听伊索寓言。”

得墨忒尔（Demeter）和一只燕子、一条鳗鱼的未完成的故事，简简单单，可是经演说家一渲染，新奇有味。显然，得墨忒尔的身份——希腊神话中掌管农业、结婚和丰饶的女神——赋予了这个故事特有的吸引力。试想，如果得墨忒尔不是身份特殊的“女神”，她有可能带着燕子和鳗鱼一起旅行吗？当燕子和鳗鱼突然不再跟随得墨忒尔





而分道扬镳时，听众岂能不关心这位“女神”的反应？得马得斯洞悉听众心理，顺口便说“她生你们的气呢”，进而批评这些听众“不关心城邦大事，一心只想听伊索寓言”。伊索不再去描绘当时现场的反应，而是赶紧兜售他的教训：“只图享乐，不务正业的人，是愚蠢的。”

这个寓言真是个好镜子，让读者既照见了别人，也瞥见了自己：难道我们不也和那些听众一样，都是爱听故事、“只图享乐”的人吗？也许被得马得斯“棒喝”了之后，我们才不得已悻悻然与那些听众一样，思索得马得斯、伊索包裹在故事中的道理。人们听一个故事，阅读一篇小说，向来像寓言中的那些“愚蠢”得“可爱”的听众一般，被那些意外的情节、人物、语言、节奏……所迷住，然后乖乖地接受包裹在“故事”中的各种或明或暗的信息和教导。

但如果人们分析一下这个故事是“谁”讲述的，如何被讲述的，可能就会发现故事背后的问题，就如一场演出结束，演员谢幕之后，我们看到舞台上的工人就开始忙碌起来，后台也松懈下来，卸装的卸装，收拾道具的收拾道具，导演、编剧都可能在夜宵中露了面，我们这时才看到了演出后面的生活的真相。《演说家》这则寓言后面的“真相”是什么？是它隐含着两个叙述者，一是演说家得马得斯，一是寓言作者伊索。伊索操纵着“演说家”，“演说家”则利用了得墨忒尔。得马得斯用全知的视角去说故事，这种视角让他隐藏了起来，使人们误以为得墨忒尔真的生气了——其实是伊索故事中的得马得斯生气了。得墨忒尔这位女神——女性——被男性的伊索和得马得斯用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并“帮助”他们巧妙地传达了他们自己的理念。可惜我们听不到得墨忒尔真正的声音，她是被塑造出来的符号，她因而是沉默的，她被两位男性叙述所“代表”

了。那么，故事里，哪些声音是真正属于演说家得马得斯的，哪些是伊索的呢？

当然，这样来分析故事背后的意识形态、阶级、立场、性别、视角等等，可能会破坏作为一个整体的“故事”给人带来的快感，不过，却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一个“故事”是这样讲述的，而不是那样讲述的。在不同的讲述方式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权力关系？譬如得马得斯为什么要借伊索的得墨忒尔寓言来教训他的听众？伊索为什么要借助得马得斯的故事来传达他的理念？这些，似乎都不仅仅是“美学”上的问题了。

由伊索寓言，我不禁想到《圣经》里关于“男人”与“女人”的故事。它们又是怎么被叙述出来的呢？这，也是很值得琢磨的。我们不妨看看头三章中关于亚当与夏娃被上帝创造出来时的故事。第一章叙述了上帝创造天地之后，“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谁，读者不知道。但他好像听到了“上帝的话”，这个“上帝”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是一个复数，因此，“我们”似乎是在对话、商量之中决定“造人”的。这个“复数”的“上帝”到了第二章就变成了单数，而且有了一个特定的指称“耶和华”。从复数的上帝到单数的耶和华，这个变化究竟用了多少时间，我们无从猜测。但从“多神”到“一神”对以色列和未来的基督教而言，显然是非常关键的变化。

这位耶和华用“七天”的时间（我们想象是宇宙的时间，不是人间的时间）完成了创世的巨大工程。在造人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同时造男人与女人，而是先造了



男人。《圣经·旧约》这样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讲述耶和华故事的人，又听到了耶和华的话，但耶和华似乎是“自言自语”的：“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趁着亚当沉睡时，“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这里，有三种声音是需要区分的：一是讲述者听到的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是“独白”，与第一章复数的上帝不一样，那是“众神”之间的对话；二是亚当的声音。这是亚当被“创造”之后第一次说话，他给世上万物命名，包括为女人命名。这也是女人第一次被男人所定义；三是讲述者的声音，他不仅记录了“上帝”的话、亚当的话，他还对他们的话做了解释。我们是到了第三章才听见了第四、五种声音，即“蛇”的声音与夏娃的声音。夏娃被蛇“诱惑”，非常坦诚地说出了“耶和华”的禁令，蛇则披露了上帝设立禁令的秘密：“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夏娃在这里是个容易受诱惑的女人；也是一个能欣赏果子的美并享受快感的人，一个热爱智慧的人；她还爱着亚当，让他也吃了果子。

讲述故事的人听见了众神的对话，耶和华的独白，看

到了亚当和夏娃诞生，亚当为世界万物命名，蛇与夏娃的对话，夏娃领着亚当偷吃禁果的整个过程。这个被基督教认为是“原罪”的肇端，在它发生的刹那，全被一个退隐在故事后的讲述者看到了眼里——这个“在场”的神秘的讲述者究竟是谁？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谁。但《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的作者梁巧娜女士在第二章“性别与叙述”第二节“从神话透视男性叙述与女性地位”里，恰好比较详细地分析了这三章叙述的演变，并且很确切地告诉我们说，这一定是一个男性。她了解《创世纪》是所谓“摩西五经”之一，可能像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汇集了古代以色列人创造的诸多神话故事”。梁巧娜虽然没有为我们做细致的考证，但她从非宗教的“理性”出发，判断这是“希伯莱神话”，而且认为《创世纪》从第二章开始就进入了“男性视角的叙述”，而且，“叙述者借着神的话语权威来制定男女的尊卑制度”了。这判断是很典型的女性主义的判断。

不过，梁巧娜似乎并没有把“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化”，她似乎很清楚运用女性主义方法的限度和边界，对她来说，重要的是揭示在文学创作中，男性、女性作家如何“按自己的观念和标准来创造男性和女性”，而不是制造男女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显然，从性别的视野入手分析文学作品，梁巧娜远不是第一个，但她确是很独特的一个。外国文学原是她观察思考问题的重要资源，但她没有局限于这一领域，对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亦多所关注，因此，在分析她所面对的问题时，对材料的运用就往往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而不显得局促。她是细心的研究者，可能因为本人是女性的缘故，她对“性别意识”与文学形象之间的关系，尤有独到的观察。她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在细读的基础上，梳







理了一条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生成与变迁史。作者并不刻意标榜什么新潮的理论，然而，她用来梳理问题的方法，却是目前深具影响力的，它融合了女性主义的视角（而不是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后殖民文化研究的立场和解构的、叙事学的方法，把向来易被遮蔽的“性别意识”揭示了出来，分析了这种有意无意的性别意识对塑造文学形象的深刻影响。从本书第三章开始，读者会看到她对不同时空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的不同女性形象的有趣分析，从完美的“象牙女郎”，反抗男权的“泼妇”形象，从男作家笔下“潘金莲”形象的变异，到女作家笔下对女性形象的形塑，娓娓道来，而不乏激情和批判，既体贴作家创作的心理期待，又敏锐揭示出中西历史、社会意识的变化。让人印象较深的，是第五章“男作家与潘金莲”，把古代和现代的潘金莲形象的变迁做了相当细致的个案研究，挖掘出这个“文化符号”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不同意义。第六、七章对英美小说中四个女性形象的分析也相当专业。看得出来，这部著述，作者确实花费了不少心力，因此才显得比较厚重、扎实，切近文本，不务空谈。

女性主义批评方法——不论是文学批评，文化批评，还是社会批评，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富有活力的思想方法之一。我曾把它称为“左撇子”思考，对于习惯于使用“右手”的主流社会而言，“左撇子”存在着，却总是被忽视。梁巧娜的著作提醒了我们“左撇子”的存在，而且其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实际上在深刻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假如习惯于使用“右手”的我们也采用这种“左撇子”的思考来重读经典，我们可能也会发现被“右撇子”的“男性主义”所遮蔽的思想的原始状态。譬如让我们回到上面

讨论的《创世纪》头三章，如果我们把叙述者假定为“男性”，固然有利于批判“男权社会”借助“宗教”把女性的定义（“夏娃系亚当肋骨说”）本质主义化的阴谋。但如果叙述者是恰好是“女性”呢？如果耶和华不是一个“父亲”的形象，而是人类最早的母系社会的“母亲”的形象呢？——难道最早给儿童讲述故事的人，不是母亲吗？柏拉图就曾想净化母亲讲述的故事，因为它们对儿童产生的影响最深。中国神话中，造人的女娲就是女性。——如果这样来看耶和华与亚当的关系，就不是父子的对立关系，而是母子的亲密关系。耶和华对夏娃的惩罚，也就不是男人对女人的惩罚，而是女人对女人的“愤怒”和“嫉妒”。亚当的“肋骨说”也就不是男人对女人的强迫性定义，而是希望两性相互依恋、不要分裂的哀求。正如德国女性主义神学家E.M. 温德尔所指出的，“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正是“圣经”的遗产之一，而“奶”和“蜜”是“对女性文化价值尺度的回忆，因为乳汁是母亲的产品，蜂蜜来自雌蜂国”，在这个土地上，“生命质量所拥有的既俭朴又简单”。在这种文化中，“和平是可能的，那时候武器很少，侵略罕见，男女之间势均力敌。在那里流淌着乳汁与蜂蜜，是它们的优先权决定着生命”。温德尔认为，后来兴起的侵略文化淹没了母权制下的和平景象。“对男性的狂热崇拜将女性排除在共同塑造集体的大门之外”，“某些权力总是想消除对和平生活的记忆，这些权力属于人类的恐惧与侵略的历史”<sup>2</sup>。“侵略势力”出现之后，女人讲述的故事在生活中逐渐消失了。男性开始主导各种故事的叙述。我们看流传下来的较早的有署名的文学作品，似乎大抵是男性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不用说了，古希腊的悲剧家、喜剧家都是男性。只有写抒情诗的萨福，似乎是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女性，她的抒情诗保留了女人的故事的特



色。在中国,《诗三百篇》第一篇就涉及男女问题,这样“哀而不伤”的抒情,听口气还是很像中国的男人,里面的篇章大部分是男性的作品,虽然很少署名。班昭、蔡文姬、李清照这样亮丽的名字,在中国古代的写作史上,毕竟不多。

十八世纪崛起的女性主义构成了“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它对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建构,对现代哲学、美学、文学与艺术的影响,实在举足轻重。当代的女性主义从女性的“边缘”角度批判男权社会的“现代性”,有助于唤起我们对早期的男女共建和谐社会的记忆(如果曾经有过这样的社会的话)。梁巧娜的《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可能也是这个记忆的一部分。台湾作家朱天文写于1990年的小说《世纪末的华丽》中,有一句让我读后永难忘记的话:“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读了梁巧娜的这部新书,我没来由地联想到,“理论”与“制度”可能是男人标榜其“现代性”的重要标志,然而,当女性主义也建立其“理论”与“制度”时,她们与男人的界限在哪里呢?或者反过来说,如果男人也依靠“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他们是否与女人更为接近呢?

梁巧娜刚把她的新书《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寄给我时,真把我吓了一跳!她常有类似出人意外的举动,往往是久无音讯,然后,突然出现,而且总会带来一两篇她琢磨了许久的论文。衡文论人,不免会见仁见智。读她的东西,也不总是都能同意她的观点,因此,常会从我的立场或视点出发,信口开河一番,谬误自然也难免。不料,从此就被她“缠”上了。而每次拜读她的大作,我都会被她

表面谦逊内里倔强的性格所“折磨”：我必须认真阅读她的文章，而且一定要为她提出一点可供讨论切磋的意见，方能逃出她的手心。记得她在北京访学时，我曾与她谈及做学术研究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方今之世，名缰利索，举世竞奔，很难静下心来，沉潜思考。当时即听她推托似的，感叹在外省做学问的艰难，不止是学术信息不通畅，还有种种世俗的压力，她因而自谦自己做的不够深入，觉得在那样一个“小地方”，写文章，教书，似乎都像是在“混日子”。何况她一方面教书，一方面为人妻、为人母，为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操心，如何能有更高的期待？云云。现在看来，这好像是她的“韬晦”之计或障眼之法，眼前突然冒出的《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就是明证：她用了五年磨一剑的功夫，硬是挣脱了套在自己身上的种种束缚，写出了一部颇有趣味的著作。我很为她高兴，因此，当她嘱我为此书写序时，我虽犹豫踌躇，自知不是恰当的人选，但终于还是不惮冒昧，絮絮叨叨，班门弄斧，写出读后的一点感想，既是对她刻苦用功的敬意，也算是摆脱她的“折磨”的一种办法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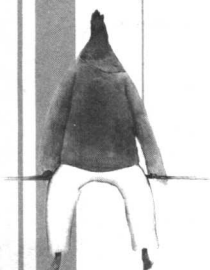
2004年6月30日于北京

---

1 《伊索寓言》，第30—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 E. M. 温德尔注：《女性主义神学景观》，第1-3页，三联书店，1995年。





## 序

### 1 前 言

### 5 第一章 导论

#### 6 第一节 性与性别

##### 6 一、生物性别 (sex)

##### 7 二、社会性别 (gender)

#### 10 第二节 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

##### 10 一、男性视角与男权制

##### 16 二、女性视角与妇女运动

##### 18 三、女性视角在中国

##### 21 四、女性视角与文学

#### 24 第三节 性别视角对文学创造与解读的意义

##### 24 一、男性或女性视角中的盲点

##### 25 二、自塑与被塑的差异

### 29 第二章 性别与叙述

#### 30 第一节 “事件”与“叙述”

##### 30 一、叙述的潜在意义

##### 32 二、叙述中的性别意识

#### 37 第二节 从神话透视男性叙述与女性地位

##### 38 一、希伯来神话中的性别意识

##### 44 二、希腊神话中的性别意识

##### 47 三、中国神话故事中的性别意识

##### 49 四、美女变“祸水”的根源

### 59 第三章 “象牙女郎”与创造者

#### 60 第一节 象牙女郎的隐喻

##### 60 一、男性期待的完美女性品质

##### 62 二、女性“失语”与男性“代女人言”

#### 65 第二节 男性作家笔下的“理想女性”

##### 65 一、但丁与贝雅特丽丝

##### 67 二、莎士比亚和“理想女性”苔丝德梦娜及其他

##### 70 三、雨果与爱丝梅拉达

##### 73 四、普希金与达吉亚娜

|     |                     |
|-----|---------------------|
| 75  | 五、奥尼尔与诺拉            |
| 79  | 六、曹禺与榛芳             |
| 83  | 第三节 女性作家笔下的“理想女性”   |
| 84  | 一、简·奥斯丁与伊莉莎白        |
| 87  | 二、夏洛蒂与简·爱           |
| 90  | 三、米切尔与媚兰            |
| 94  | 四、紫式部与紫姬            |
| 99  | 第四节 作家叙述中性别意识的作用    |
| 99  | 一、男性集体想象中的完美女性模式    |
| 102 | 二、传统文化中集体想象的本质：男性中心 |
| 105 | 三、自我想象中的完美女性        |
| 109 | 第四章 泼妇与男权           |
| 110 | 第一节 男权社会秩序的颠覆者      |
| 111 | 一、西方文学中的泼妇形象        |
| 116 | 二、中国文学中的泼妇形象        |
| 138 | 第二节 泼妇撒泼的内因         |
| 138 | 一、对一夫多妻制的反抗         |
| 143 | 二、对生存危机的焦虑          |
| 151 | 第三节 泼妇存在的另类价值       |
| 151 | 一、对男性绝对权威的挑战        |
| 157 | 二、对权力的强烈欲望          |
| 160 | 第四节 泼妇形象的文化内涵       |
| 160 | 一、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否定        |
| 163 | 二、对温顺忍耐品德的弘扬        |
| 175 | 第五章 男作家与潘金莲         |
| 177 | 第一节 施耐庵与潘金莲         |
| 177 | 一、好女人与坏女人           |
| 187 | 二、潘金莲：十恶不赦的淫妇       |
| 190 | 第二节 兰陵笑笑生与潘金莲       |
| 190 | 一、情色与灾祸             |
| 197 | 二、潘金莲：溺毙男人的祸水       |

202 第三节 欧阳予倩与潘金莲

202 一、压迫与反抗

209 二、潘金莲：宁死不屈的女英雄

220 第四节 魏明伦与潘金莲

212 一、被害与害人

219 二、潘金莲：走投无路的弱女子

223 第五节 反刍潘金莲的意义

223 一、女人的身体与社会意识形态

226 二、女性的欲望与罪恶

231 第六章 反抗与结局

232 第一节 不做天使的两个女性

234 一、还原利蓓加

242 二、还原简·爱

248 第二节 一样的反抗两样的结局

250 一、利蓓加：名利场上的冒险家

263 二、简·爱：争取女性独立的先驱者

268 第三节 性别意识与叙述策略

269 一、夏洛蒂：用简·爱展示真实的自我

274 二、萨克雷：用主观议论为利蓓加定性

283 第七章 求生与求爱

285 第一节 两个女性的求生之道

285 一、苔丝艰难的求生之旅

290 二、思嘉迂回的求生之术

300 第二节 两个女性的爱情追求

300 一、苔丝：要做爱情的奴隶

310 二、思嘉：要做爱情的主人

317 第三节 性别的樊篱

317 一、苔丝：解构与重构

321 二、思嘉：善恶杂糅，共存并行

327 主要参考书目

329 后 记



促使自我特别关注文学作品中作家的性别意识与读者解读作品的性别视角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主要来自大学生们的一次课堂讨论。

那是一次让我永远不能忘怀的课堂讨论。当时作为外国文学教师的我向大学生们介绍俄国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依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教材的阐述，我亦将安娜的悲剧根源归为当时腐朽黑暗的俄罗斯上流社会的迫害和花花公子渥伦斯基的变心，再加上所谓的安娜个性中的矛盾和弱点。这是我们外国文学教材中长期以来维持不变的一个结论。之后我想听听学生的见解，于是安排了课堂讨论，让学生们自由地来阐释造成安娜的悲剧根源。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在这次课堂讨论中，出现了观点完全对立的两极现象。

相当多的男性学生对安娜一片谴责之声，其中还夹有不少刻薄的嘲讽。他们中的许多人给予了卡列宁充满肯定的评价，卡列宁成了正面人物获得不少赞美之词，渥伦斯基则深受男生同情。安娜受到抨击嘲讽的理由主要是她太自私，只顾自己的幸福而不顾他人的幸福，他们认为这种人生观、道德观不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都不应提倡，因为从结局上看，她的追求既没有使她获得幸福，也没有给他人带来幸福。另一方面，也有学生认为安娜作为一个才智出众的成年人，不是不知道她自己“婚外恋”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她既然不遵守上流社会认可的那套规则，又想过上流社会的那种生活，太过贪婪，只知“要”不知“给”，只知“进”不知“退”，最终得到众叛亲离的结局，那是活该。

另一方面，则有相当多的女学生对安娜充满同情和赞美，认为安娜为追求真正的爱情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和行为令人折服。安娜既然为爱渥伦斯基而付出了一切，她有理由要求渥伦斯基还报她于同



等的爱，但渥伦斯基却没有付出，所以他是间接“杀死”安娜的凶手。而卡列宁的所谓“道德感”与“责任心”则是十足的虚伪，不值一提。

在讨论之中，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每当对方亮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时，一些学生便大声起哄，气氛很不友好。讨论没有“最后”，因为没有得出什么一致的结论，因为双方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寻找各种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来谴责对方。一方认为渥伦斯基“杀死”了安娜，一方认为是安娜“杀死”了渥伦斯基——使他生不如死。

我则为讨论之中男女学生的对立态度和言辞中强烈的主观色彩深感惊讶。

为什么会有不少男性将安娜对爱情的追求视为人性的堕落？另一方面，他们将卡列宁视为一个“讲道德，有责任心”的好男人，理由主要是他身居高位，却不贪污不腐败，既不嗜血也不好色，在安娜“堕落”的时候还颇有一些“忍辱负重”的行为和表现。他们认为这样的男人即使放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应完全失去人们的同情。这些站在卡列宁的立场上来看安娜思想和行为所得出的最终判断，以及站在安娜的立场上来看待卡列宁或渥伦斯基的行为所推出的结论，令我不得不深思，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个视角来审视这些复杂的文学形象才更全面呢？那些学生所采用的视角所存在的盲点究竟在哪里？

我们手中的教材自然是对卡列宁一片谴责之声，对安娜则是无限同情和褒奖。但是，为什么学生对教材中的“权威”说法产生如此强烈的逆反？我们的教材又是从哪个视角来审视文学形象的？我们对卡列宁的谴责，除了他虚伪之至、不解风情之外，与他是沙皇手下的重臣是否全无关联？我们谴责渥伦斯基，与他的出身和地位是否全无关联？我们遗憾安娜跳不出贵族的生活圈子，最终造成悲剧，是不是存在一种假设，认为她只要跳出贵族的圈子，就可以改变自己所属的阶级阵营，从而跳出个人的追求并最终在投身为大众谋利益的追求之中获得真正的幸福？

这似乎又回到了意识形态问题之上了。在八十年代，我们国家的文学反思热点就已经围绕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得如火如荼；九十年代，女性主义批评话语也在批评界轰轰烈烈地展开，而这些话

